

抗日战争研究

KANGRI ZHANZHENG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图书馆报刊

3
1992

封面设计 马晓光

本刊明年改由邮局发行

本刊明年由邮局发行，欢迎各单位和广大读者订
阅。

需购本刊1991年、1992年各期者，请与本刊编辑部
(地址见封二)联系。

抗日战争研究

1992年第3期

出 版 者 近代史研究杂志社

印 刷 者 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行组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代号 Q187

北京市期刊登记证刊号

ISSN1002—9575

CN11—2890/K

国内定价 2.50元

抗日战争研究 (季刊)

1992年第3期 总第5期

目 录

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作战重心之转移

——与台湾学者讨论发动淞沪会战的战略意图

问题……………余子道 (1)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述评……………李隆基 (22)

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

……………(加拿大)徐乃力 (44)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七次“七七”宣言……………曹雁行 (57)

评江口圭一教授《卢沟桥事件》一书

……………曲家源 (75)

有关卢沟桥事变的地名续考……………郭景兴 吕淑革 (88)

卢沟桥事变研究综述……………荣维木 (103)

通城保安大队·八百壮士·孤军营·其后行踪

……………丁 一 (116)

抗战前期中国政治发展的民主化趋势……………杨 群 (129)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关志钢 (143)

抗战爆发前后外国人对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

地的考察……………居之芬 (160)

抗战时期的在华苏联军事顾问……………王 真 (176)

三个日本“中国通”与“华北分治”	齐福霖 (190)
“何梅协定”之辨析	熊宗仁 (205)

《八路军丛书》编纂情况

.....国防大学八路军史料丛书编委会办公室 (217)
读杨成武《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一书.....叶运均 (223)

· 抗战纪念地纪念馆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创建和展览学术活动

.....刘建业 (229)

· 学术信息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编撰《桂林文化城》系列丛书

.....王 昶 (241)

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学术活动.....王海珠 (242)

北京举办晋察冀文艺史料展览.....陈 禹 (244)

· 书讯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的抗日战争史著作简介

.....李 强 黄发仁 (244)

《宋哲元传》出版.....陈 中 (56)

读者·作者·编者..... (247)

本期英文目录..... (253)

图片.....封三

本期发稿时间 1992年5月21日

出版时间 1992年8月15日

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作战重心之转移

——与台湾学者讨论发动淞沪会战的战略意图问题

余子道

八一三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第一个大规模战役，也是八年抗战中屈指可数的重大战役之一。这次会战，中日双方先后投入近百万兵力，历时近四个月，其规模之巨大，参战兵员数量之众多，作战情况之复杂，战役过程之持久，在抗日战争史以至中国近代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场大规模会战对于中国的战略防御和整个战局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按照忠于历史、遵循科学的原则，评析淞沪会战的战略意义及其与全国军事战略格局之间的关系，是抗日战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课题。台湾军事史和民国史学界一些著名学者，若干年来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不少论著，尤其是提出了关于淞沪会战与中国军队作战方向问题的颇为引人瞩目的论点，也使我们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作者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论析，并求教于台湾同行。

淞沪会战在正面战场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与影响是怎样的，它对中日两军作战方向的调整和改变发生过什么作用？台湾军事史和民国史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回答显然是有变化的。70年代初期，台湾著名近代史学者吴相湘教授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对于淞沪会战的军事战略意义有过这样的论述：“从纯军事观点来看：日军拥有便利的海洋交通，容易发挥陆海空军的联合威力。中国的后方交通不便，军队集中很为迟缓，在上海和日军施

行阵地战似不得计。但从全国地形来看：如果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日军作战，还不如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作战比较有利。中国军队在上海和日军激战三个月，使得在华的日军不能任意行动，他们还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来上海作战，造成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这是战略上的成功。”^①台湾著名史学家张其昀教授在吴相湘之前，在他的《党史概要》一书中，亦持此一论断。^②

但是，从70年代后期以来，台湾军事史和民国史学界发表的为数众多的论著中，提出了一种与上述看法不同的新的论点，而且广为流行。他们认为，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即决策扩大淞沪战役的规模，把中日战争的作战重点主动地由华北战场转移到华东战场，引诱日军改变作战方向，从“由北向南”改变为“由东向西”；这个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是抗战初期“战略之最大成功”，是“抗战致胜的决定性战略作为”，从而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首先对上述问题提出论断，并进行了系统的论析的，是曾任台湾三军参谋大学校长，大型抗日战史《抗日御侮》一书总主编的蒋纬国将军。^③1978年4月，他在《抗日御侮》绪论中写道：蒋介石“在野战战略指导上，当战争爆发之初，即诱导日军作战指向错误方向：八一三淞沪集中国军精锐，采取攻势，迫使日军追随国军行动，改变其作战线由北向南方向为由东向西方向。因此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5月版，第392页。

② 张其昀：《党史概要》（又名《近八十年中国革命史》），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3月第2版，第1153页。

③ 这一说法在台湾最早出现于1966年10月“国防部史政局”编印的《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一书，时任台湾“参谋总长”的黎玉玺在该书序文中提出：蒋介石“洞察”日军以精锐部队沿平汉线南下直捣武汉的企图，乃主动举行淞沪会战，吸引敌军主力，从而迫使日军改换作战正面，从“由北而南”改为“由东而西”。但是，这一说法在台湾史学界的广为流行，则是70年代中期开始的，《抗日御侮》一书是这一说法的主要代表作。

中国获得换取时间之空间，从容将华东华中人力物力，搬迁西南，在大后方建立持久抵抗战力。此一野战战略指导，打破日军‘速决战略’，使中国抗日战争，持久到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合，中国乃由独立奋战，演进与同盟国联合抗日，遂造成必胜之势”。①在抗日战争时期参与最高统帅部决策的何应钦将军，在为《抗日御侮》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也提出了他在以往的抗日战争史中从未表述过的论断，说南京统帅部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即“以大军对淞沪日军采取攻势，不惜牺牲，迫使日军将主力作战由华北移于华东方面。因此，日军将其原可由北平南下汉口最有利的作战线，改采由上海西向汉口最不利的作战线，使国军获得一年又两个月时间。中国以此十四个月时间，将华东、华中凡可供建设抗战基地——民国二十四年选定之民族复兴根据地之人力物力，概行西迁。中国凭借抗战基地持续不绝之供应，作到力能‘持久’，遂将日本‘速决’企图打破。日本既不能‘速决’，因而导致与中国政治、经济有密切关系之国家支援中国。于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基地，确切奠定”。②

虽然，无论是蒋纬国或是何应钦都没有举出任何足以置信的史实，来佐证蒋介石和南京统帅部在何时、何处，是怎样作出诱使日军改变“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作战方向的决策，但却高度评价这一战略决策的意义。蒋纬国反复称颂说：这是“战略指导上的杰作”，“这一杰作，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企图；造成了中国持久抗战的条件；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③台湾著名军事学家徐培根将军也对此作过高度的评价，认为蒋介石在八一三事变之初，已“窥破”日军“由华北进攻华

① 蒋纬国：《〈抗日御侮〉绪论》，《抗日御侮》第1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10月版，第3页。

② 何应钦：《序〈抗日御侮〉》，《抗日御侮》第1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10月版，第4—5页。

③ 蒋纬国：《八年抗战胜于开战之先》，《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4月版，第19页。

中与华南”的“诡计”，乃决策“以主力军猛攻上海之日军”，从而迫使日军“转移其作战重点于长江方面，遂将其原定由北向南之战略，改为由东向西之进攻”。他还认为，南京统帅部棋高一着，主动引诱，“使日军陷于泥沼，八年而不能自拔。所以此一改，实为中日两方面胜败之转折点，亦为总统蒋公最高之战略运筹”。^①

在台湾史学界，有不少学者赞同蒋纬国等人的论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吴相湘教授的文章。他在《中国对日的总体战略》一文中，修改了《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一书对淞沪会战战略意义的评价，着重论述了中国统帅机关“诱使日军作战正面由南下转变成西上”的问题。他说：在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以后，如果“日军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铁路直趋汉口，并出洛阳堵塞潼关，则中国势将被东西纵断为二，长江下游军队民众及物资设备都无法西运。西北、西南大后方建立工作也徒劳无用，持久抵抗战略自然也不能实现”。他认为，蒋介石在当时就洞察这一危险性，决定举行淞沪会战，“诱使日军主力使用于华东而不在华北”。^②他称崇这一决策说：“蒋委员长诱使日军主攻方向由‘自北南下’改变成‘自东西上’的战略终于成功。中国从此再不必忧虑有被日军东西纵断为两部分的危险，一切可按1935年7月的‘持久作战’计划了。”^③李云汉教授的《对日抗战的持久战略》一文，也完全肯定了南京统帅部诱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的决策，认为这一决策乃是贯彻抗日持久战略的关键。1987年7月，在台北举行的“抗战建国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不少学者更是认为淞沪会战的最重大的战略意义，在于“改变日军作战线方向”，这是抗战“初期战略上之最大成功”。^④

① 徐培根：《序〈抗日御侮〉》，《抗日御侮》第1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10月版，第57页。

② 吴相湘：《中国对日的总体战略》，香港《明报月刊》，第127期。

③ 吴相湘：《抗战八年的重要会战》，香港《明报月刊》，第139期。

④ 参见《近代中国》第80期，台湾《近代中国》杂志社，1987年8月版。

综上所述，台湾军事史和民国史界不少学者对于淞沪会战的新论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举行淞沪会战是蒋介石为首的统帅部主动地、有计划地引诱日军改变作战方向的战略决策；（二）淞沪会战的发动，使日本被迫增兵上海，日军不能不按照南京政府的意志把作战重心由华北移到华东；（三）淞沪会战和华东战场的开辟，诱使日军的作战方向从“由北向南”改变为“由东向西”，从而造成了中国军队的有利战略态势，为实现“持久战略”奠定了基础；（四）南京统帅部的上述决策是抗战初期战略指导上的最大成功，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作者以为很有必要在揭示有关史实真相的基础上，对这些论断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

二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以极大的决心毅然举行淞沪会战，其战略意图是什么？在这个战略意图中是否包含了诱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的军事战略企图？南京统帅部在当时是否已经作出了引诱日军改变作战方向的决策？这些都是研究淞沪会战的战略意义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南京统帅部发动和举行淞沪会战，其作战决策基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等诸方面的因素，是抗战初期一个影响全局的重大的战略举措，其战略意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了保护上海地区经济政治利益的需要。上海是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全国经济中心之所在，政府的财政税收、经济命脉和江浙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以及西方英美列强的在华利益都集聚于此。在南京当局看来，如上海失守，其后果远远超过失去晋、绥、冀、察等地，因而势在必保。正如陈诚所说：“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①吴相湘在《第二次

^①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时史料选编》，第7页。

中日战争史》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八一三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军队毅然调集主力作战，是要保卫金融经济重心，上海又是中外观瞻所系，所在不惜牺牲。”^①

二是为了拱卫首都南京和守卫长江。上海地处宁沪杭三角地区之东沿，上海—南京战役方向是一个整体。上海在当时是世界上第五个、也是中国最大的军港，它不仅是进入江浙皖赣地区的海上门户，而且是溯长江进入我国内地的水路咽喉。南京统帅部是完全明白这个重要性的。大本营在八月二十日颁发的《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就指明了上海作战的战略企图是：“该战区应以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为作战指导之基本原则。”^②

三是为争取国际干预，广征与国，孤立日本，借以造成和平解决的契机。上海既是中国经济中心，又是一个国际都市，世界各大国尤其是英、美、法、德、意等列强的权益在此错综复杂，盘根错结。南京当局正是有鉴于此，深知上海战事扩大，将直接损害英、美、法列强在华利益，必将震惊世界，引起列强关注，从而极有可能导致美、英、法等国的插手干预，调停中日之战。即使日军不接受调停，也可借以扩大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使中国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

四是在军事战略上分散敌军的兵力，滞迟敌军的进攻，以利于逐步实施“持久消耗”战略。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军队在平津一带奋起抗战，首先开辟了华北战场。当时战局的重心是在华北，日军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针，首先解决华北，造成既成事实，逼迫中国政府就范。淞沪抗战的发动，是为了在华东开辟第

① 吴和润：《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5月版，第392页。

② 南京大本营训令第四号：《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6页。

二战场，分散敌军的兵力，牵制敌军在华北的进攻，迟滞敌之攻势，从而使敌兵力分散，疲于两面作战，而我国则可争取更多的时间，转入全国抗战轨道，部署持久抗战。蒋介石在淞沪会战结束后也说过：“我们这次为什么要在上海作战呢？就是要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①

显然，南京统帅部开辟和扩大淞沪战役是受上述几个因素制约和决定的。南京当局之所以比华北战场高得多的积极性和使用多得多的兵力，来举行这场会战，其真正原因就在于此，而不是什么引诱日军改变作战方向的战略意图。这些基本因素也就是指导淞沪会战的战略目的和企图。

那么，在淞沪会战期间南京统帅部是不是如台湾学者所说的那样，已经形成了引诱日军改变作战方向的战略企图呢？就目前已经披露的台湾方面的书刊来说，无论是蒋纬国、徐培根将军，或是吴相湘、李云汉教授，在他们的有关论著中谁也没有提供过任何确凿可信的史料，足以说明蒋介石和南京统帅部在当时就已作出了诱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的决策。蒋介石本人，以及当年在南京最高统帅部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又始终参与最高决策的何应钦将军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在他们的全部有关抗日战争的论著中，也从未披露过这一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形成的史实材料。至今，台湾方面也没有公布过任何一件说明这一决策形成过程的档案材料，足以令人置信。

正因为如此，国外一些研究中日战争史的学者，虽然赞同蒋纬国在《抗日御侮》和《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等论著中对这一问题所持的结论，但却也存有疑问——改变日军作战方向“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是当时作出的战略决策呢，还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总结战争时人为地所追加的一种概括？日本学者

① 转引张其成：《党史概要》（《近八十年中国革命史》），第3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3月第2版，第869页。

今井骏教授就表示了这一疑问。他写道：“对照中日战争的实际经过，我认为（蒋）纬国所介绍的蒋（介石）的野战战略的构想（按：指诱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的决策）非常合理，有说服力”；但在同时，他不无怀疑地提出：“遗憾的是，纬国所说的蒋介石8月7日的命令，以及8月20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同样主旨的决定等原始资料，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均未公开发表。因此，严格地说，蒋（介石）是最初就持有这样的构想走向抗战，还是只不过是已得结果的合理化？对于这一点尚有探讨之余地。”^①对于蒋介石在八一三事变时就已作出改变日军作战方向决策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今井骏提到的南京政府8月7日和8月20日的决定和命令，其档案在大陆已经披露，其中并无把作战重心南移华东、迫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的任何计划和意图。^②

事实上，南京统帅部当时并无主动诱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的意图，更从未提出体现这个战略意图的作战计划。作为最高统帅部参谋机关的大本营第一（作战）部，负有拟订作战计划的职责。据作战部一部分负责人的回忆，在当时研究敌我双方基本情况和战略方针时，作战部认为“举行淞沪会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很大的价值”，他们的根据是以下六项：“首先，上海抗战激发全国人民的斗志，有利于全国总动员；其次，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上海抗战可以扩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上海是国际观瞻所在，在这里进行坚强的作战，可以正国际间对中国的视听；第四，打乱敌人的作战计划，争取了主动；第五，上海是我国工商业中心，群众觉悟程度高，群众运动的影响可以振

① [日] 今井骏：《对日抗战与蒋介石》，《中国国民政府史研究》，日本汲古书院，1986年12月版，第365—366页。

② 8月7日决定，是指1937年8月7日南京国防会议正式作出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定。8月20日命令，是指同月20日国民政府大本营颁发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和《国军战争指导方案》三个训令，上述材料均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

奋全国；第六，可以掩护沿海各省工业、物资向远后方撤退。”

“因为有上面这些原因，对上海一战，大本营作战组是主张适当地硬拼的。”^①在上述六项目标中，并无提到改变日军作战方向这一点，可见当时在大本营作战部并无此种战略意图。

同样，在大本营制定的作战方针和计划中，也完全没有提出此项目标。1937年8月20日大本营以蒋介石名义发布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分析了敌军的战略企图和作战方向，规定了全国各个战区的作战指导要领。它指出：全国主战场在华北地区，平汉路北段和津浦路北段以及平绥路东段，为主战场之正面；平绥路晋察绥边界及山西方向为主战场之侧背；至于淞沪战场的作战目标，在于“对于侵入淞沪之敌，应迅速将其扫荡，以确保京沪政治经济重心”。^②同日颁发的《国军战争指导方案》，规定了8月至10月底各战区的作战任务，对于第三战区的要求是：“迅将目下侵入淞沪之敌，陆海军及其空军陆上根据地，扫荡扑灭，以准备敌军再来时应战；同时对于浙江沿海敌可能登陆之地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阻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③后来，在同年9月2日大本营发布的《淞沪抗战第二期作战指导计划》中，也并未提出转移作战重心，迫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的指导方针。由此可见，所谓南京统帅部8月间作出“主动引诱”日军，使之从“由北而南”到“由东而西”的决策之说，是缺乏根据的，因而是不足为信的。

三

淞沪会战发展到中期，确实把中日两军的大部分主力军吸引

① 唯真：《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0年12月版，第2—3页。

② 大本营《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5页。

③ 大本营《国军战争指导方案》（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页。

到了这一战场。从此，中日战争的作战重心一度从华北转移到华东，也就是说，华东战场成为当时全国的主战场，那么，战争的这一格局是怎样形成的呢？它是不是如台湾不少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实行引诱日军改变作战方向决策的结果？主战场的转移，对抗日战争的进程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台湾学者的不少论著都认为，淞沪战场发展为主战场，从中国方面来说，是从8月20日蒋介石与陈诚谈话所产生的扩大沪战的决策开始的。李云汉教授的文章在记述了陈诚关于扩大沪战的建议后，写道：“到八月二十日晚间，淞沪战役遂告扩大。从此双方均抽调大批军队增援淞沪战场。”^①他们所依据的，是陈诚在抗战结束后提供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的《回忆资料》。这是一份陈诚的口述记录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几年公布了《陈诚私人回忆资料》，现将有关内容转录于下：

“八一三”事变发生二日——八月十五日，陈（指陈诚，下同）在牯（牯岭）接李领袖（指蒋介石，下同）及钱幕尹（指钱大钧，时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等电话，召陈赴京，策定抗战计划与战斗序列。遂于十七日离牯，十八日抵京。……于十九日偕熊天翼（指熊式辉，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赴沪视察，二十日返京。……返京后，领袖询问视察情形，熊云：“不能打。”又问陈，陈云：“非能打不能打之问题，而是打不打的问題。”领袖问：“何意？”陈云：“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趋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以牵制之。”领袖遂云：“一定打。”陈又云：“若打，须向上海增兵。”遂发表陈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而整个中日战争亦即由此揭开。^②

陈诚为黄埔系高级将领，为蒋介石所宠信，其扩大沪战的建议对

① 李云汉：《对日抗战的持久战略》，台湾《中国论坛》第8卷第7期。

② 《陈诚私人回忆资料》，《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蒋加强淞沪抗战的部署起了积极作用。他提出的预防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武汉的主张，富有战略眼光，不失为高明之见。但蒋、陈这次谈话不仅从未提出改变日军“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的问题，就是把淞沪战场扩展为全国主战场的问题也未作构想。陈诚的建议，一方面确认“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另一方面主张“扩大淞沪战事以牵制之”；显然，其主要意图是以扩大沪战，牵制日军在华北的攻势。这一作战构想，是在以华北为主战场的前提下，扩大淞沪之战，其中包含着发展淞沪战场为主战场的可能性；但这与把沪战扩展为主战场的决策，还不能混为一谈。

事实上，无论是蒋介石还是陈诚，在8月间都还没有把淞沪战场作为全国主战场的作战指导思想。8月11日，蒋介石批准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先发制敌”的建议，命令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和第三十六师挺进上海，进攻上海日军，其时的作战目标是“扫荡上海敌基地，阻止敌军登陆，确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①8月13日，组成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和张发奎第八集团军，18日，又组成陈诚第十五集团军，以三个集团军使用于淞沪战场。但是，直至同月20日，南京统帅部还未视淞沪战场为主战场，这在同一天发布的大本营《国军战争指导方案》中有明确的规定，其中写道：“为统帅指挥之便利计，将全军区分为四（个）战区，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②这时，统帅部把河北境内之平汉路方面和津浦路北段作为主战场之正面，山西和平绥线方面作为主战场之侧背，淞沪战场亦为重要战场，但尚未列为主战场。

从战局发展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八一三事变爆发时，日军在平津地区的兵力共有3.5个师团，在南口、张家口地区的部队有1个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两个支队，总计在华北战场

①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湾国防部史政局，1982年9月第3版，第13页。

② 大本营《国军战争指导方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12页。

的日军兵力约10余万人。8月24日，日本参谋本部决定组建华北方面军，继续增兵，至同月底，华北方面参战兵力共有8个半师团，17万余人。在淞沪战场，开战之初，战争规模并不大，日军共有海军陆战队和海军部队近1万人。8月5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23日，日军两个师团在上海近郊登陆，至8月底，淞沪战场日军总兵力约5万人。当时，日军全部常备兵团共有17个师团，分组5个战略集团。到9月初，共分布为：关东军4个师团，驻我国东北；朝鲜军1个师团，驻守朝鲜半岛；华北方面军6个师团，在华北战场；上海派遣军两个师团，在淞沪战场；国内常设军4个师团，驻守日本。其用兵重点置于华北，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军队的部署，在8月底以前仍以华北为作战重点，这从同年8月底全国各战区兵力配置情况可以得到确证。当时，第一战区以平汉路北段和津浦路北段为作战方向，共辖25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两个骑兵师及部分特种兵。第二战区以晋绥方面为作战方向，共辖28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7个步兵旅及部分特种兵。以上第一、第二战区的兵力，全部使用于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河南、山东等省，总计为53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9个步兵旅，约占当时全国第一线总兵力一百个师的百分之六十多。在华东战场，根据第三战区8月20日的部署，直接参加淞沪战场作战的有步兵5个半师、1个旅，警备部队约两个师，炮兵4个团及其他特种兵。此外，江南守备区有步兵3个师、炮兵1个团；浙东守备区有步兵5个师、4个旅。总计第三战区兵力约为步兵20个师、6个旅，炮兵6个团及部分特种兵，而在淞沪直接参战的还不到8个师。但是，此种情况在8月下旬开始有了变化。8月21日，第十五集团军正式组成，下辖第十八、第三十九、第七十四军，第六师和炮兵第十六团等部，进入上海北郊长江沿岸地带与浏河以东地区作战。这表明，蒋介石、陈诚“扩大淞沪战事”

“以牵制之”的意图已开始付诸实施，也预示着淞沪战场发展为

主战场的趋势。

淞沪之战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全国作战重点南移华东战场，发生在9月中旬到10月中旬的近30天内。战局的这个重大变化，以战争的客观发展趋势而论，乃是淞沪之战自身的地位和性质所决定的。由于上海在政治、经济、军事、交通、中外关系等方面具有极端重要作用，既为敌所必攻，也为我所必守，既然在开战后30天内不分胜负，战争规模必然继续扩大，不到一定限度是绝不会终止的。从作战双方的实力和战争指导而论：日本方面由于国力和兵力不足，主观上又过低估计中国抗战力量，迷信于“九一八”以来多次作战一击取胜的经验，对淞沪之战采取了逐次增兵的方针；中国方面由于统帅机关为了保卫上海以及沪杭宁长江三角地区，企图以沪战配合其在国际上的举措，也为了牵制敌在华北的攻势，对淞沪之战不惜一再增兵，甚至孤注一掷。这就形成了敌我双方轮番增兵、反复增兵的趋势，使用兵力和作战规模越来越大，终于上升成为全国的主战场。

日本继8月16日第一次向上海增兵海军陆战队4个大队，在8月23日第二次增兵陆军两个师团，9月11日第三次向上海增兵3个师团又1个旅团。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日本又将华北方面的两个师团大部、东北方面的1个师团、国内新动员的1个师团调归上海派遣军指挥。于是，日军在上海方面的兵力，增加到9个多师团，10月上旬其总兵力已超过20万人；而华北方面的兵力则下降为7个多师团。这样，日军“将主作战场转移到华中”。①

中国方面从9月中旬开始，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大了淞沪战役的兵力部署。9月2日，南京大本营发出《淞沪抗战第二期指导计划》，决定以陈诚集团为江岸防守军，张治中（后为朱绍良）集团为上海围攻军，张发奎集团为浦东防守军，担负淞沪战场之作战。至同月中旬，到达淞沪前线的中国军队约为50个师和

① 《日》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版，上册第374—375页。